

谭嗣同与唐才常的办报活动与报刊思想研究

陈寒雪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 辽宁省大连市, 116622; 1140723633@qq.com)

摘要: 作为近代湖南维新人士的代表, 唐才常和谭嗣同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他们创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报刊如《湘报》《时务报》等, 掀起了近代国人办报的第一次浪潮, 促进了湖南报刊业的繁荣和提升了维新派的办报水平。因而梳理他们办报活动与报刊思想, 可为我们研究近代的报刊事业提供重要路径。

关键词: 唐才常; 谭嗣同; 报刊; 维新思想

引言

谭嗣同和唐才常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浏阳二杰”。他们为当时的中国救亡图存, 维新变法作出杰出贡献, 并前赴后继以崇高的精神献身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并以自己的牺牲对之后的民主革命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维新变法的成员, 两人很早便意识到想要拯救中国, 首先应该兴民权; 想要兴民权, 前提要开民智。唐才常和谭嗣同充分认识到报刊在兴民智和传播维新思想上的重要作用, 由此, 二人在共同理想的追求中, 合作或独立创办报刊, 近代史上第一次办刊高潮也随着维新人士的活动拉开序幕。

1. 谭唐办报思想的来源

谭唐二人作为近代维新改革人士, 其思想大多源自自身经历和现实需要。在当时社会背景下, 报纸在传播思想和传递信息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 因而受到他们的重视。

唐才常作为湖南维新事业的参与者, 在湖南近代报刊事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为近代报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他认识到, 报刊在开化民智和宣传维新思想上有独特的作用, 为此他写到, “迺者海内诸君子, 曲体朝廷育才至意, 广开报馆, 用代道人, 大声疾呼, 海天同应。于是秦汉以来之愚障, 始云开雾豁, 重睹光明; 于是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 辗转桎梏者, 始脑筋震荡。” [1]他认为随着报纸的普及, 大众能够从中广泛的获取知识, 作为新的信息传递方式, 报纸更广泛实用, 对于想要打破千年以来对人民智力的桎梏, 亦有重要的影响。

谭嗣同的报刊思想, 源自于他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熏陶的影响。谭认为想要革除当下社会的积弊, 就应该从西学中学习先进思想。谭嗣同所接受的西学知识多是来自翻译书籍和报纸, 为此他曾多次在书信和著作中提到报纸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他所写的《报贝元征》、《兴算学议》、《报唐才常书》、《与唐绂丞书》、等一系列文章、信札、著作中, 就鲜明地提出了报刊对于推进维新事业、挽救民族危亡重要性。

总而言之, 谭唐的报刊思想多数源自他们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担忧。甲午战败是二人思想的转折点, 甲午战败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让二人意识到民族危机。而报纸作为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其宣传作用渐渐被谭唐所重视。

2. 谭唐办报活动及体现出的维新思想

谭嗣同和唐才常在近代的报刊事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们创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报刊, 掀起了近代国人办报的第一次浪潮。其中《湘学新报》《湘报》是由二人共同创办的报刊, 《湘报》作为湖南第一份日报, 其发行不久, 就销售了六千余份, 这在当时也是很可观的。《湘报》十分关注政论和新闻, 会登载各种奏疏、电旨、各地新政、各国时事, 还设有“答读者问”。报刊、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的三位一体的互相配

合，给湖南的维新事业带来了新的力量。《时务报》则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言论阵地。谭唐二人都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其中可窥见二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成果，从而总结出其维新思想的变化和形成。

唐才常在担任《湘学新报》主编时，他大胆著文，发表了《交涉史》《外交论》《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公法通议》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唐才常介绍了西方的文化、政治、历史和经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建设民族工商业。在主编《湘报》时，他的文章言语用词激烈，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他发表了《论热力》《湖南设保卫局议》《时文毒流中国论》等文章，探讨学习西学的必要性、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民的束缚以及对当下中国危害等现实问题。此外，唐才常在1899年来到上海，主编了由日本人所创办的《亚东时报》，并渐渐将其转变成宣传维新改革思想的阵地。

谭嗣同在《湘报》发表了《论湘粤铁路之益》《论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壮飞楼治事十篇》等多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在《壮飞楼治事十篇》中，他阐述自己对于新政主张，想要通过实行新政来挽救民族危机，拯救中国，可谓是充满了热烈的爱国之情。此外，谭嗣同所参与的《时务报》影响重大，他在《时务报》发表了《报章文体说》为中国近代报章文体改革提供理论基石，除他以外，梁启超《农会报序》《叙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汪康年《论将来必至之势》等多篇文章均发表在时务报中，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时务报》是维新派宣传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阵地；除上述报刊之外，谭嗣同还参与筹办《民听报》《矿学报》以及支持《农学报》《女学报》的创办等。

纵观唐才常在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大抵概括出他维新思想。在政治上，他抨击中国的封建统治，反对君主独裁，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1]他认为欧美国家富有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唐才常看来，西方富强在于优越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制“公权于民”“人人出其爱力以保国权，而国不富之者，未之有也。”[1]，而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政治制度落后，“官私其权”人民无权利意识，不关心国家事物，导致“四万万其人，且四万万其心”[1]的社会现状，故而国家贫困落后。为改变这一现状，他想要通过变法改变制度，在变法早期，唐才常坚持走和平改良路线，其变法思想底色是武力勤王。直到戊戌“六君子”遇害，以及他出国受到具有革命思想留学生的影响，从而逐渐转为反清革命，因此在“戊戌时期”，“自上而下和平改良道路”和民主制所要求的民主、民权之间的矛盾，是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中的特点；在经济上，唐才常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发展工商业来达到富国的目的。他认为农工商并重，“中国但有各国商埠，而无立埠他国之利，漏卮所出，尾闾不足壅其流”[1]，也应该学习西方国家。他还提出要加强船舶业的发展“所立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船，以资护卫而壮声威。”[1]。在文化上，他反对传统封建文化、抨击纲常伦理，并认为时文是一种流毒，“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1]，他倡导经世致用学，倡导学习西学的先进内容，“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吾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1]；此外，唐才常还发表了多篇对于外交的文章，他认为任何国家都应该相通以求自存，主张国家之间应加强交往和交流，他认为“夫国于地球之上，必欲子焉而独立，微独今所不能，亦且古无此理。公法家亦云从古无独立之国。”[1]“中国通亦通，不通亦通，与其通于人而失自主之权，何如通于己而扩小民之利。且吾民之耳目心思，非通末由新也；吾民之农商工艺，非通末由师也。”[1]

总的来说，唐才常的维新思想是符合当时维新派的主体变法思想。主张走和平改良道路，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试图用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引领中国走独立的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思想为湖南维新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思想潮流。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在维新派中是最为激烈的，他的办报思想激进特色十分明显，他对近代报刊理论的贡献可谓是同时代最具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近代国人办报理论思想的高度。谭嗣同在他所发表的办刊和言论中，呈现出更为激烈的思想。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统治，在实行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改良主义。他还提倡“民贵君轻”的思想，他曾写到，“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必可共废之”[3]在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并认为人人可任之。此外，谭嗣同提倡西学，呼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他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在文化上，谭嗣同猛烈的抨击传统礼教，他深刻的揭示了封建纲常名教的黑暗，批判三纲五常，认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大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2]。他指出封建纲常禁锢思想，迫害心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建立学-政-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并认为经济、文化十分重要，除了改良政治和发展经济，也应该进行深层次思想文化变革。在经济上，谭嗣同建议建立机器工业，发展民族工商业。他批判“黜奢尚俭”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尚奢”，才能达到“其财均以流”的“人我通”的目的，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经济富足、国家强盛是十足重要的竞争力，他也提到过，“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人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2]

总的来说，谭嗣同在报刊的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见解，在政治上倡导改良主义，提倡文化深层次变革，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经济。谭嗣同的维新思想，深刻且彻底，为后续的变法提供了思想道路。

3. 谭唐办报的影响

纵观谭嗣同与唐才常的报刊活动以及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谭唐是因“兴民权”的政治目的出发，为了“开民智”的前提而创办报刊，想要通过报刊的信息传递功能，来揭开封建思想对人民智慧的禁锢。二人首先在湖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办报刊的活动，针对湖南的维新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意见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报刊事业的发展；二，对报刊理论的贡献；三，对维新事业的影响。

3.1. 对报刊事业的发展

近代的第一场办报高潮，始终都是由维新派发起的。唐才常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后主编《亚东时报》。谭嗣同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主编《时务报》、并筹办了《民听报》《矿学报》以及支持《农学报》《女学报》的创办等。在这其中《湘报》《时务报》的影响力最大。

谭唐所创办的报刊，在近代掀起了办报的浪潮。《湘报》作为日报，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了解到时事，可以开启民智，使民众接受民权观念的知识文化基础，同时可以向群众灌输民权思想，从而对“兴民权”的目标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时务报》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言论阵地，不仅在当时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后人办报提供了现实参考。可以将报刊作为宣传的工具，报纸可以传递信息、教化民众、宣传思想等。促进了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和繁盛。

3.2. 对报刊理论的贡献

谭嗣同与唐才常的办报行为，对与促进近代中国的报刊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唐才常的办报事业，虽未形成明确的报刊理论，但在其具体的活动中，展示出他对于报纸以及报刊事业的理想。首先，他认为报纸是信息传递沟通的重要工具。《湘报序》中，他写到“广开报馆，用代道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1]，“道人”指古代上下政令、民风交流的方式，具有上令下达，民情上达的功能。唐才常认为报纸具有这种上下沟通的功能；其次，他认为报纸应作为“民口”，利用报纸的宣传功能，可以向民众宣传新思想、民权文化知识，他人也可借用报纸阐述自身思想，民众可借用报纸，实行民权。最后。他认为报纸的文风、文体应改革。他认为《湘报》应“义求平实，力戒游谈，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亦以使圆妒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1]。唐提倡报章文体应该文辞朴实无华，内容应通俗易懂，让阅读的群体不局限于读书人。在《时文流毒中国说》中，唐也谈论到文体改革的必要性。

谭嗣同的报刊思想对于近代报纸的发展影响深远，闪烁着不同于同时代的智慧光芒。一，谭嗣同认为报纸是宣传民权思想最重要的工具。他说“而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然而学会设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而况于外县，而况于外府？”“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且又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3]；二，报纸助日新说，以往报刊所刊登的内容，在登出时已经不算最新。新书到达读者手上时，也可能变成旧思想，故创办了旬刊，但旬刊也是数十天的旧内容，至刊登是也已经旧，“十日以前之新，而至今日已旧”，正如他在《湘报》后序上所写。“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3]。故而应创办日报，日报刊登迅速，阅读日报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思想，“出之，其于日新之义庶有合也”⁽²³⁴⁾；三，报刊文体的变革。谭嗣同提出“报章总宇宙之文说”，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谭嗣同总结了自古以来所有的文体，他认为在一篇文章中，将多种文体融合在一起，并非守旧派所说的不合时宜，近代报刊文体的融合汇集是“兼容并包，同条共贯，高挹遐览，广收毕蓄，识大识小，用宏取多”的文体，是几千年以来的“总宇宙之文”的文体[3]。

3.3. 对维新事业的影响

唐才常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如何改良政治、如何建立民族工商业，发展经济、如何革除封建遗留，对于近代湖南维新事业产生了总要影响，尤其对湖南省的报刊行业有着重要影响。他十分重视报刊的开民智作用，他说，“是一举而破两千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厅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收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旁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4]。他发表的《湖南设保卫局议》《时文毒流中国论》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湖南不良的社会风气，给湖南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新思维、新活力。同时借助报刊的宣传作用，给湖南的士绅阶级、普通民众“洗清大脑”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风气转移、民智渐开。他所创办的《湘学新报》作为旬刊，在当时是能够快速反映时事新闻的，但由于文

字晦涩难懂，故而又创办了力求“苟日新，日日新”的《湘报》，正如《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5]一文所说，已经成为了助日新的有力工具。

谭嗣同针对湖南以及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为挽救国家民族危机，谭嗣同以报纸进言、献策，他大力倡导阅读报刊，对读者进行思想的启蒙并唤醒民众意识。通过发表报刊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由、自主的认识。在文章中，彻底批判封建制度，提出政治改良，呼吁“兴民权”，产生了重要且久远的政治影响。同时，谭嗣同所提倡的报刊的报章文体写作和设立报刊校对，对于近代的报刊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谭嗣同在报刊的管理方面也颇具贡献，他在办理报刊的活动中，重视报刊管理经营，将报纸的经济功能发挥到极致，创造的报刊收入，这也为维新派的事业带来了另一项经济支持。在近代进行报刊活动的文人学士之中，很少有既能发表有影响力文章，还能够参与报刊的创办、经营、管理、写作、编辑以及发行的人。但谭嗣同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在报刊的写作和管理上，他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总而言之，谭唐以报刊为阵地，以社会形势为背景，对社会积弊提出解决方式，向封建文化提出猛烈的批判。他们在报刊文章中畅谈国家事务，借助报刊的宣传作用，提出设议院、伸民权、开学校、废科举，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大力宣传了维新派的思想，并逐渐打开民智。不仅为维新事业提供经济支持，并且促进了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和完善。

4. 结语

谭嗣同和唐才常作为近代湖南维新人士的代表，二人的报刊思想对近代的报刊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才常在报刊所体现的思想，早期偏向温和的改良主义，所发表的文章也能体现出，他有提出有效的建议，但他的思想具有一定保守性。谭嗣同的办报活动相对更多，以及在报刊中体现的思想也更加全面和彻底。谭唐的办报活动，为维新事业带来了重要的作用，在开民智、兴民权、宣传维新思想等方面意义非凡，并为维新运动提供了经济支持。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报章文体问题的原创性理论，证明了维新派所开创的报章时务文体的合理性，这是谭嗣同给中国近代报刊文体变革的理论基石。同时唐才常的办刊思想促进了湖南报刊业的繁荣和提升了维新派的办报水平。可以说，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报刊新闻思想对近代的报刊事业提供了现实参考。

作者简介

陈寒雪（1998—），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唐才常集[M].中华书局, 2013.
- [2] 《谭嗣同集上》整理组.谭嗣同集[M].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 [3] 《谭嗣同集下》整理组.谭嗣同集[M].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 [4] 宋梧刚, 潘信之.唐才常传[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5] 卢刚.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J].船山学刊, 2003(2): 102-104+134.